

## 唐代诗文聚焦下的草圣张旭

金学智 陈本源

**摘要:**本文是正在编写中的《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》中的一节。正史对张旭的记载极为简略,但如果对唐代有关诗文加以爬罗掘拾,并加以集中编织,一个性格丰满、生气勃勃的草圣形象就跃然纸上。在唐代诗文聚焦下,他表现出多方面的成就,是狂草名家、抒情诗人、艺术理论家和艺术教育大家;其性格内涵更是丰富复杂,是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里不多见的“圆形人物”的形象。李颀称他为“太湖精”,杜甫称他为“东吴精”,他无愧于太湖精灵、东吴精英的称号。

**关键词:**艺术个性;亦圣亦颠;圆形人物;“太湖精”;“东吴精”

和唐人选唐诗是中国诗史上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学现象一样,唐人咏写唐代文化名人,也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历史文化现象。中国书法史到了唐代,出现了两位极负盛名、极有个性的草书家——“颠张醉素”。书僧怀素及其草书创作,是当时诗坛的热门题材,诗人们竟以《怀素上人草书歌》为题予以异口同声的讴歌,而怀素又从这些诗作中撷取一系列佳句写入著名的《自叙帖》。这种文学、书法的往复互补,构成了唐代艺术史上一道空前绝后的奇丽风景线。至于张旭,似乎没有这样的机缘,《新唐书》对他只有六十余字的简略记载。但是,如果对唐代有关张旭的零散诗文加以爬罗掘拾,并加以集中编织,那么,一个性格丰满、生气勃勃的草圣形象就跃然于唐代文学史上。

张旭,生卒年不详。字伯高,曾官金吾长史。宋人朱长文《续书断》说:“张长史,苏州吴人也,为人倜傥闲达,卓尔不群,所与游者皆一时豪杰……后人论书,欧、虞、褚、陆皆有异论,唯君无间言……文宗时,诏以李白歌诗、裴旻剑舞、长史草书为‘三绝’。”

同为“三绝”之一的诗仙李白,与草圣张旭颇为相似:豪放,奇逸,嗜酒……唐肃宗至德元年,李白因避安史之乱离宣城赴剡中路上,遇张旭于溧阳,在酒楼同饮,其《猛虎行》写道:“楚人每道张旭奇,心藏风云世莫知。三吴邦伯皆顾盼,四海雄侠两追随。”“三吴”一句,说明他作为吴郡书法名家,对三吴一带影响特大;“四海”一句,又说明所与游者确乎“皆一时豪杰”。朱长文《续书断》在引了李白上述四句评道:“太白,奇士也,称君如此,君之蕴蓄浩博可知矣。主荒政废,不见抽擢,栖迟卑冗,壮猷伟气,一寓于毫楮间,盖如神虬腾霄汉,夏云出嵩华,逸势奇状,莫可穷测也。”这是对“心藏风云世莫知”一句最好的阐释。

嗜酒豪饮,催兴醉书,电激星流,颠放不羁……这是张旭最为突出的艺术个性。唐代诗文对此有着淋漓尽致的多方描述:

张公性嗜酒……露顶据胡床,长叫三五声。兴来洒素壁,挥笔如流星。(李颀《赠张旭》)

兴来书自圣,醉后语尤颠。(高适《醉后赠张九旭》)

张旭三杯草圣传,脱帽露顶王公前,挥毫落纸如云烟。(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)

张长史则酒酣不羁,逸轨神澄。回眸则壁无全粉,挥笔而气有余兴。若遗能于学知,遂独荷其颠称。虽宜官售酒,子敬挥帚,遐想迹观,莫能假乎。(窦泉《述书赋》)

旭饮酒辄草书,挥笔而大叫,以头搥水墨中而书之,天下呼为张颠。醒后自视,以为神异,

不可复得。(季肇《唐国史补》)

华夏文化史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,这就是“作为一种刺激性的兴奋剂,酒对于爱酒或嗜酒的书家特别是草书家来说……更能成为催兴唤情之具,催动灵感,唤起亢奋,从而掀起发自灵台的感情狂澜……这种情感、情欲、兴会、冲动,是一种创作动力,是借酒引发出来的,所以杨凝式诗说,‘草圣本须因酒发’。以酒发书或以酒催书,从而引起创作情欲或唤起创作冲动,是古代书法家惯用的感情酿造方式”<sup>①</sup>。这种情况,最突出地体现在颠张和醉素身上。这两位草圣通过艺术实践把书文化和酒文化融贯为一体了。上引李颀的诗,重点描述了张旭醉后奋笔疾书的举止神态:脱帽露顶,据于胡床,甚至是狂呼长叫,或奔走踊跃;兴会来时,在素壁上纵情挥洒,笔飞墨舞,疾如流星。在李颀笔下,这一特殊的豪杰之士被描写得多么虎虎有生气!高适的一联,则写出了“圣”和“颠”这看来难以相容的矛盾,在张旭身上通过“兴”和“醉”得到了高度的统一,从而刻画了这位亦颠亦圣的书法家形象。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,不仅把张旭和豪饮“一斗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”的李白,放旷纵诞,无复规检,醉后属辞,动辄成卷的“四明狂客”贺知章等并列为“饮中八仙”,而且其“脱帽露顶王公前”,突出了张旭笑傲王侯的放旷,“挥毫落纸如云烟”,极写张旭信手挥洒,逸状奇势顿生笔下,如云烟般地变态不穷。窦冀的赋,则用骈俪的语言,铺陈其酒酣不羁的创作,不但具有“回眸而壁无全粉”的惊人速度,而且具有“挥笔而气有余兴”的纵放气势,是一种不同于“学而知之”的天才创造。窦冀把张旭比之于师宜官嗜酒,书酒肆之壁,酒因大售;比之于王献之以帚泥书壁,观者如市,这更突出了张旭的酒兴与书艺。李肇的笔记散文,又重点描写了张旭醉后的颠狂臻于极致,而其挥毫创作的书法美,又臻于醒后不可复得的神异境界。

对于张旭的处世、生活、心胸、志趣、性格,唐代诗文有着或细致或简括的描述:

……豁达无所营。下舍风萧条,寒草满户庭。问家何所有,生事如浮萍。左手持蟹螯,右手执《丹经》,瞪目视霄汉,不知醉与醒。诸宾且方至,旭日临东城。荷叶裹江鱼,白瓯贮香粳。微禄心不屑,放神于八纮。时人不识者,即是安期生。(李颀《赠张旭》)

世上漫相识,此翁殊不然……白发老闲事,青云在目前。床头一壶酒,能更几回眠?  
(高适《醉后赠张九旭》)

拘素屏及黄卷,则多胜而寡负。犹庄周之寓言,于从政乎何有?(窦冀《述书赋》)

李颀的诗,侧重写张旭的“豁达无所营”。诗中展示了一幅画面:其屋舍寒风萧飒,四壁空空,门庭长满了杂草也不加整治……如果有人要问起他家中何所有,诗人代为答道:他不事生计,得过且过,犹如随波逐流的浮萍。这既是对“豁达无所营”的具体渲染,又是对张旭一生嗜酒而又临池不辍的间接描写。李颀还进一步描写他左手拿着螃蟹作为下酒菜肴,右手则拿着一部“仙人之书”——《丹经》。“瞪目视霄汉,不知醉与醒”二句,更活画出张旭亦醉亦仙的神态。诗中还选取了另一个生活镜头:旭日东升,诸宾方至,张旭以荷叶裹着的江鱼、以盆盂贮着的香粳米这类普通食物“宴请”宾友,这又进一步可见张旭的心胸豁达,不拘小节。“微禄心不屑,放神于八纮”,写出张旭不求官阶,对俸禄不屑一顾,把名利地位视同粪土,而让自己的精神奔放于天地的四方八极,其心胸之豁达无碍,其气质之行神如空,于此可见。正因为如此,当时不理解他的人,竟把他当作成了仙的方士安期生。高适的诗,从另一侧面突出了张旭不同流俗的性格。对高适的诗,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云:“世俗交谊不亲,而泛云知己,所谓漫相识也。”而张旭与这种“世上漫相识”的庸俗社交习气迥乎不同,他摒弃功名,意在青云,除了沉浸于艺术生活之外,就是闲逸超脱,醉眠度日。郭璞《游仙诗》说:“寻我青云友,永与时人绝。”在高适笔下,张旭就是这样一位超越凡庸尘俗的“青云友”。窦冀的赋,说张旭醉心艺术,蔑视从政,和庄子一样,“彼视三釜三千钟,如观蚊虻相过乎前也”(《庄子·寓言》)。

张旭虽然不愿从政,但他毕竟当过官,如金吾长史,而且据唐人张固《幽闲鼓吹》说,他还当过常

熟尉。该笔记生动地记载了他一件富于戏剧性的轶事：

张长史释褐为苏州常熟尉。上后旬日，有老父过状，判去。不数日复至，乃怒而责曰：“敢以闲事屡扰公门！”老父曰：“某实非论事，但观少公笔迹奇妙，贵为篋笥之珍耳。”长史异之，诘请其何得爱书，答曰：“先父爱书，兼有著述。”长史取视之，曰：“信天下工书者也！”自是备得笔法之妙，冠于一时。

这位“老父”胆敢冒“屡扰公门”之大不韪，并不是真要张旭为其断案论事，也不是蓄意纠缠不清，而是想再一次得到张旭判状时所批“笔迹奇妙”的字以“为篋笥之珍”。由此可见张旭书法巨大的艺术魅力。而张旭则通过细心询问，获悉“老父”藏有的先父墨迹及书学论著；他又进而通过借阅观赏、细心揣摩，更“备得笔法之妙”，使自己的书艺更上层楼。而“信天下工书者也”一句，又展示了张旭性格的另一侧面：不是目空一切、唯我独优，而是择善而师、虚怀若谷。这与他“脱帽露顶王公前”那种高傲自负，“醉后语更颠”那种放诞颠狂恰好截然相反，艺术家的这种虚心好学、精益求精的态度令人生敬。李颀《赠张旭》又说他一生无所求，“皓首穷草隶”，可见其又具有锲而不舍、一意专攻的精神。再联系传世书作来看，张旭不但有著名的《草书古诗四帖》，而且有著名的楷书《郎官石记》，这正如鉴赏家们所指出，其狂草的功力来自楷书，其狂放的基础在于谨严。而杜甫的《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》诗，在借助于通感移觉，赞扬了张旭“锵锵鸣玉动，落落群松直。连山蟠其间，溟涨与笔力”的艺术风格和功力后，紧接着写道：“有练实先书，临池真尽墨。俊拔为之主，暮年思转极”。他借用汉代草圣张芝勤学苦练的故事<sup>②</sup>，来说明张旭高超的书艺成就离不开孜孜不倦临池的苦功，可见草圣的桂冠来之不易；又赞扬张旭暮年变法，艺无止境的追求，可见草圣桂冠的保持更属不易。

对于张旭，韩愈的散文名篇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有更为精彩纷呈的片断：

往时张旭善草书，不治他伎，喜怒、窘穷、忧悲、愉佚、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无聊、不平，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焉发之。观于物，见山水崖谷，鸟兽虫鱼，草木之花实，日月列星，风雨水火，雷霆霹雳，歌舞战斗，天地事物之变，可喜可愕，一寓于书。故旭之书，变动犹鬼神，不可端倪，以此终身而名后世。今闲之于草书，有旭之心哉？……

这段名文，是以繁丰的辞趣、短促的节奏、整齐而不乏错综的词语、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酣畅的气势所写的草圣颂。它揭示了张旭书法创造和艺术性格的多重内涵。首先，它寓议论于形象，通过与他人的对比，从正面赞颂了“旭之专一于书”，不治他技，又从反面说明，“不专一其心者，业必不能精”（高步瀛《唐宋文举要》）。其次，它不但具体展示了张旭内心感情的强烈、丰富，显示了他属于激情型艺术家，而且写出了他的种种激情经由酣醉，痛快淋漓地倾泄于书，这种笔卷狂澜、墨飞急雨的生命冲动，使其狂草突出地成为如孙过庭《书谱》所要求的“泼发于灵台”并“达其情性”的艺术，而张旭本人也可说是主情论书法美学的艺术标本。再次，张旭善于观照和吸取自然造化之变，“探于万象，取其元精”，亦即游心于“自然万象的‘势’、‘气’、‘神’，把它们融之于书，合而裁之，会而通之”，使笔法、线条契合于“自然万象的精神、意味、气势、形式……”<sup>③</sup>正因为如此，其狂草如韩愈所说：“变动犹鬼神，不可端倪”。

李肇《唐国史补》还有如下具体记载：“旭言：‘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，而得笔法之意。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。’”这同样说明了张旭的艺术创造重在感悟。此二例，正是韩愈所说的“歌舞战斗”。而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诗序写得更为具体生动：“往昔吴人张旭，善草书书帖，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《西河剑器》，自此草书长进，豪荡感激……”这实质上是通过张旭写出了“书舞同势”的美学。张旭的狂草艺术，“借用闻一多先生《说舞》的语言来形容，它确乎是‘生命情调最直接、最实质、最强烈、最尖锐、最简单而又最充足的表现’，它通幅是‘节奏的动，或更准确点，有节奏的移易地点的动’。它的线条和动势似乎都是从公孙大娘舞剑器中来的：浏漓顿挫，激昂豪荡，纵

横跳跃,回旋低昂……”<sup>④</sup>张旭狂草的艺术创造,令人想起杜甫此诗中的名句:

燿如羿射九日落,娇如群帝骖龙翔;来如雷霆收震怒,罢如江海凝清光。

由此可见,张旭又是一位妙于感悟、触类旁通从而不断长进的艺术大师。而其妙悟,正在于张旭“专意此事,未尝少忘胸中,故能遇事有得,遂造神妙”(吕本中《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》)。

作为不可及的一代高峰,张旭的狂草已臻于圣境极致,但是他并不满足,还进一步将其体会感悟提到理论层面进行思考、总结。清人董浩、徐松等编的《全唐文》中有张旭的学生、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《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》。此篇不仅是重要的书学论文,而且也是别开生面、妙趣横生的优秀叙事散文。文章开头写道:

仆顷在长安,二年师事,张公皆大笑而已,即对以草书,或三纸五纸,皆乘兴而散,不复有得其言者。仆日再于洛下相见……因问裴微:“足下师张长史,有何所得?”曰:“但书得绢屏素数十轴,亦尝论诸笔法,唯言倍加工学临写,书法当自悟耳!”

颜、裴急于求成,一再向张旭请教笔法,但这位老师只以大笑或挥毫作答,学生们总是“不复有得其言”。这说明他注意和讲究教学方法,主张让学生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自己体悟,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学理论的强烈要求,而不让学生走捷径,一下子轻而易举地得到妙诀。这正是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方式的创造性运用,这里,时间过程的充分孕育,也是极好的教学手段。于是颜真卿更是“日月滋深,夙夜工勤,溺于翰墨……”在回京师前,他再次请教笔法要诀,文章写道:

长史良久不言,乃左右眄视,拂然而起。仆乃从行,归东竹林院小堂,张公乃当堂踞床而坐,命仆居于小榻,而曰:“笔法元微,难妄传授,非志士高人,讵可与言要妙也……”

这段文字,活画出这位极富个性的艺术大师的举止神态。他感到已是瓜熟蒂落之日,水到渠成之时,妙诀已可言传给学生们了,但他还是“良久不言”,这既表现了沉着从容的独特教学风范,又是对以何种方式传授的深思熟虑,还表现了他十分珍视凝聚着数十年艺术智慧的书诀,不愿轻易授予,率尔讲出。待到林院小堂师生有序地坐定,他才既郑重其事又傲然自得地讲出“笔法元微”的一番话来作为引子,真是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。在讲授“十二意”过程中,他也不取直接注入、和盘托出的方式,而是用启发式、问答式,他总是略一点拨,让颜真卿自己来思考、回答。讲完“十二意”,他又循序渐进,因势利导,进一步讲述“印印泥”、“锥画沙”等妙于感悟、更为高深的书理。颜真卿“自此得攻书之妙”。这篇文章生动有致地描述了传艺讲学的全过程。该文蕴含的教学原理,至今还有现实意义。它应在中国教育史、苏州教育史上占一席之地。

张旭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,尤擅七绝。《全唐诗》收其仅存作品六首。其中如:

隐隐飞桥隔野烟,石矶西畔问渔船:桃花尽日随流水,洞在清谿何处边?(《桃花溪》)

山光物态弄春辉,莫为轻阴便拟归。纵使晴明无雨色,入云深处亦沾衣。(《山行留客》)

在前一首中,飞桥隐隐然不甚分明,是由于野烟迷濛间隔。在这模糊如梦的境界里,石矶参差,清溪迂回,落英缤纷,流水潺潺,人们必然会产生武陵渔人的遐想,这种细致精微的描写,令人陶醉。后一首写春日游山,劝人不必因天色微阴担心下雨而罢游,因为即使是晴天,白云深处也会沾湿衣服,这又表现了细腻微妙的感受。张旭的写景绝句,境界幽深,构思婉曲,是唐代诗坛上值得注意的佳作。

杜甫《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》的结尾写道:“念昔挥毫端,不独观酒德。”这正是余韵绕梁,含意深永。事实正是如此,张旭不仅以嗜酒酣醉著称于世,而且在唐代诗文聚焦下,他表现出多方面的成就,其性格内涵更丰富复杂,有着多重化的结构:既似醉似醒,不事生计,又头脑清醒,专心致志;既癫狂傲世,自鸣得意,又不骄不躁,虚怀若谷;既粗放不羁,艺交豪侠,又诗思婉曲,细致入微;既豁达大度,不拘小节,又深思熟虑,精益求精;既勤学苦练,锲而不舍,又诲人不倦,循循善诱;既是

笔意飞动、连绵不绝的狂草名家,又是端正谨严、一笔不苟的楷书圣手;既是“人中之龙,邈焉寡俦”(郑杓《衍极》)的书法家,又是写景清幽、风格别具的诗人;既是修养有素、善于妙悟的艺术理论家,又是经验丰富、教学有方的艺术教育家……

就这一系列层面的复杂构成来看,其性格诸元之间,似乎颇有差异,甚至极为矛盾,然而这正是丰富、丰满的充分表现,借用黑格尔论理想人物性格的话说:“就性格本身是整体因而是具有生气的这个道理来看,这种始终不一致正是始终一致的,正确的。因为的人的特点就在他不仅担负着多方面的矛盾,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,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……”<sup>⑤</sup>唐代诗文聚焦下的草圣张旭,体现为一个具体的、多面的、立体的、流动的、完满而有生气的、丰富矛盾通过内在联系而统一性格系统,从这一形象上,还可进一步抽绎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:

一、英国的爱·莫·福斯特“把性格单一化的人物称为扁形人物,而把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称之为圆形人物”<sup>⑥</sup>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,扁形人物居多,圆形人物则如凤毛麟角。而唐代诗文对张旭聚焦这一特殊形态的“集体创作”,为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圆形人物的形象。这一形象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,也不无现实的启发意义。

二、古代的诗文浩如烟海,但它们无不作为单篇而个别存在。这些作品是零碎的,分散的,不起眼的,但如将其爬罗剔抉,集中编织,互参互补,相辅相成,却能补正史之不足,提供相对完整的人物史实,同时,对文学史、艺术史来说,这种原生态的史料也特别可贵,虽然其中不免带有夸饰的成分。

三、对于张旭,李颀《赠张旭》中有“时称太湖精”之说,杜甫《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》也有“呜呼东吴精”之赞,这又为地方文学艺术史的撰写,提供了内涵极深的原生态资料。“精”者,精灵、精英之谓也。李、杜把它和地理环境太湖、东吴紧密联系起来,暗示了一条人才学的规律:天才的诞生、杰出人才的出现,需要种种条件的聚合交臻,其中也离不开优越灵秀的地理环境的孕育。苏州地处太湖之滨,山明水秀甲于东南。王勃说,“物华天宝”,“人杰地灵”(《滕王阁序》),“天宝”“地灵”“物华”的优越地理环境,“造化钟神秀”,孕育了辈出的人才。作为草圣的张旭,其身上也体现了“精灵之气,氤氲积聚”(孔颖达《易系辞》疏)。太湖的山川秀气,东吴的人文传统,先天的孕育,后天的勤奋……共同造成了杰出的书法家、诗人张旭,他无愧于太湖精灵、东吴精英的称号。张旭在特殊的地域里诞生,对于全面、深入理解苏州文学史乃至一切地方文学史,是有其普遍的启发意义的。

注:

①金学智:《中国书法美学》上册,江苏文艺出版社,1997年版,第104页。②张芝,高尚不仕,善草书,精劲绝伦。家之衣帛,必先书而后练;临池学书,池水尽墨。(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)。③金学智:《中国书法美学》下册,第943—946页。④金学智:《中国书法美学》上册,第445页。⑤黑格尔:《美学》第1卷,商务印书馆,1997版,第306页。⑥引自刘再复:《性格组合论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,第478页。